

堪萨斯大学东亚图书馆
五十年

275



276

1864 年, 堪萨斯州议会授权建立堪萨斯大学 (以下简称堪大), 1866 年大学正式开办。它是堪萨斯州早期创办的几所公立高校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 包括堪萨斯大学在内的一些有规模的大学都开始提供跨学科的国际区域研究课程。1950 年, 堪萨斯大学的两位东亚专家, 地理学者托马斯·史密斯 (Thomas Smith) 和政治学者弗兰西斯·海勒 (Francis Heller) 提议开设有关东亚政府和政治方面的课程。他们在评估了图书馆的藏书之后, 发现馆藏不能满足教学需要。于是他们向大学校长迪恩·马洛特 (Deane Malott) 反映了这个问题。马洛特随后拨了 2500 美元作为购买东亚社会科学图书的经费。但由于缺乏精通东亚语言的文献专家, 图书馆早已积压了大量未编目的东亚图书, 最终无法使用这笔特别经费。^[1]即便在现在, 这种有图书经费但无编目人员的情形, 在一些北美研究图书馆里仍很普遍。

[1] Francis Heller, "The Years of Chancellor Deane W. Malott," in *Per Aspera Ad Mundum: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Faces the World*, Kenneth Spencer Research Library, <http://spencer.lib.ku.edu/heller/chpt3.shtml>.

[2] Lorraine McDonnell, Sue E. Berryman, and Douglas Scott, *Federal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Role of NDEA Title VI* (Santa Monica: Rand Publications, 1981), 2.《国防教育法》第六条款及其后继者《高等教育法》第六条款的全文见 173—184 页。

[3] *Newslet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8, no. 3 (1963): 38.

《国防教育法》和堪萨斯大学的东亚研究

1957 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美国举国震惊并因此对国家安全表示密切关注。1958 年 9 月, 美国国会颁布了《国防教育法》, 联邦政府开始为全国高校的国际区域研究中心和外语课程提供支持。该法案的目的是“确保大学培养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人才, 以满足美国国防需要”^[2]。为完成这一使命, 联邦政府先是对各学科专家的培养提供资助, 包括在外语和国际区域研究方面, 后又将资助扩展到各个层次的国际教育方面。

243 因《国防教育法》的资助, 堪萨斯大学于 1959 年创立了东亚地区研究中心, 开设汉语及日语教学课程。堪大东亚地区研究中心成立的消息曾刊载于亚洲研究协会 1963 年的通讯报告中。^[3] 现今北美一百多个规模不等的东亚图书馆中, 至少有 1/3 以上的图书馆都创立于 20 世纪

[4] Tsuen-hsün Tsien, "Current Status of East Asian Collections in American libraries 1974-1975,"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Newsletter* (July 1976): 41. 20世纪60年代, 28所机构的东亚藏书按照如下顺序依次建立: 国家农业图书馆、匹兹堡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布朗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依阿华大学、美国中文图书馆(旧金山)、密歇根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堪萨斯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明尼苏达大学、奥柏林学院、罗彻斯特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达特茅斯学院、俄亥俄大学、圣约翰大学(纽约皇后区)、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迈阿密大学、俄勒冈大学、巴克内尔大学、科罗拉多大学、马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内布拉斯加大学。

60年代。大多数州立大学图书馆与赠地大学的图书馆都因《国防教育法》、福特基金会、富布赖特-海斯项目(The Fulbright-Hays Program), 以及卡耐基基金会等提供的资助而创立。[4]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 堪萨斯大学除提供语言课程外, 还开设了许多跨系课程, 诸如亚洲史、传统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远东地理、远东政府和政治、东亚史研讨课程、远东国际关系研讨课程等。在短短几年内, 至少有十几位东亚研究方面的教授开设了东亚研究课程。此外, 堪萨斯大学还与科罗拉多大学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了暑期汉语及日语集中培训课程。时任东亚研究助理教授的本杰明·华莱克(Benjamin Wallacker)在美国教育委员会1960年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为开发国际区域研究课程, (堪萨斯大学)所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创办一个专业图书馆……语言教学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掌握某种语言, 从而在日后能利用该种语言的原始资料进行研究, 而无需完全依赖他人之翻译。”《国防教育法》和福特基金会提供的资助也包括部分图书采购经费及东亚图书馆的人事经费。如前所述, 尽管堪萨斯大学校长拨发了图书采购经费, 但由于缺乏专业人员, 以致经费无法使用。为解决这一问题, 时任交换与赠送组主任的卢国邦(Karl Kwok-Bong Lo)于1961年兼任了东亚图书编目工作。

东亚馆藏的缘起

卢国邦于1958年在香港崇基学院获得化学学士学位, 又于1960年获得亚特兰大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他在1959年担任堪萨斯大学图书馆采购部交换与赠送组主任。当时, 堪萨斯大学师生经常要求图书馆购买东亚语言资料, 客观上确立了建立东亚馆藏的必要。卢在担任东亚

图书编目员的过程中，很快就展现出了才华。

1960年年初，东亚地区研究中心在向《国防教育法》资助处申请要求延长堪萨斯大学的东亚语言教学资助时，提及图书馆除了需要馆藏经费外，还迫切需要聘请一位“中/日文图书馆员”，该申请也建议“堪大图书馆建立一个独立的中、日文馆藏”^[5]。这是有关创建独立东亚馆藏的最初申请。顺应当时的潮流，东亚地区研究中心随后要求堪大图书馆正式成立一个独立的东亚馆藏。1960年11月，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沃斯珀（Robert Vosper）要求图书馆编目部主任厄尔·法利（Earl Farley）对一些著名研究机构的东亚图书馆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包
244 括密歇根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西雅图）。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东亚语文资料的编目、组织和存放，以及人事结构。1961年春天，沃斯珀与东亚地区研究中心的管理委员会为存放日益增多的中、日文资料商讨最佳方案。他们最后决定将东亚语文资料从大学总图书馆分离出来单独存放。这一决定与调查结果一致。“处理东亚资料最经济、有效的方式是将它们与总馆馆藏分别存放。”^[6]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北美图书馆的共识。

1961年，担任东亚图书编目馆员的卢国邦请求图书馆和东亚地区研究中心派他于次年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东部观摩并接受培训一个月。他的请求得了批准。他于1962年4月到达国会图书馆，受到东部主任贺拉斯·伯尔曼（Horace Poleman）的协助。这使得他从当时最具权威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获得了东亚文献编目和馆藏发展方面的第一手资料。^[7]卢国邦在谈到他与美国其他图书馆同事的交流时也表达了他对建立东亚馆藏的看法：

所有与我交谈过的图书馆专业人士都认为，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是将东亚资料从总图书馆中分出来，单独建一个专门馆藏，并处理所有业务，如图书选购和参考服务。大部分同仁也同意，由非专业人员负责图

[5]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o the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January 1960, "Proposal for Continuation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Area Center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at the KU," University Archives, 17/37, Box 2, Budget, Institutes, Library, 1960/61-1967/68, Kenneth Spencer Research Library, University of Kansas.

[6] 卢国邦1963年5月向东亚地区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存放于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研究图书馆的大学档案处2号档案柜，编号17/37；东亚语言文学系1960/61—1967/68年通信。

[7] 美国国会图书馆东部主任霍拉斯·伯尔曼1962年5月给堪萨斯大学图书馆馆长托马斯·巴克曼的信件存放在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研究图书馆的大学档案处4号书柜，编号17/37；1962—1970年东亚图书馆委员会会议纪要和公告、教授和其他大学的通信。



[8] 1962年6月,卢国邦向图书馆馆长、东亚地区研究中心主任、编目部主任和采购部主任提交的报告《卢国邦5月30日到6月8日活动汇报》,存放于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研究图书馆的大学档案处4号书柜,编号17/37;1962—1970。

[9] 采购部执行主任艾莲诺·西蒙斯1962年11月向卢国邦提供的建议存放于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研究图书馆的大学档案处,编号32/1/5;图书馆报告,1961/62—1967/68。

[10] 图书馆副馆长斯图亚特·福尔斯1963年11月与卢国邦的通信存放于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研究图书馆的大学档案处4号书柜,编号17/37;通信。

[11] 1964年到1965年,汪燮(William Wong)被聘请为东亚图书编目馆员,后前往明尼苏达大学担任该校东亚图书馆馆长。

图书馆的账务、核算、图书处理、交换、赠送和卡片是可取的。^[8]

卢国邦的上司,编目部主任艾莲诺·西蒙斯(Eleanor Symons),于1962年年底推荐卢先生晋升为新成立的东亚阅览室/图书馆主任。^[9]1963年11月,东亚阅览室开放前月余,总馆副馆长斯图亚特·福尔斯(Stuart Forth)将卢的头衔从东亚图书编目员改为“东亚图书馆馆长”^[10]。此举反映出总馆对新成立的东亚图书馆的重视。

东亚地区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经常开会商讨众多议程,包括预算、项目、新聘教员和图书资料。委员会开会地点是路易斯安那街1332号,位置虽处校外,但为当时该校东亚地区研究中心所在地。卢国邦与该委员会和图书馆行政人员的通信集中在中心的发展与东亚藏书等方面。期间,《国防教育法》和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图书经费,分由图书馆馆员和几位东亚研究的教授用来选购图书。教授出国时,图书馆会预先支付他们采购书籍的现金。图书买回来后由图书馆编目部负责验收和编目。形形色色的发票、邮资和手续费记录都显示了当时教授们在图书馆馆藏建设方面的积极参与。1963年秋,东亚地区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对教授参与购书的“经济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建议聘请一名助理馆员来协助卢国邦采购图书。委员会同意将图书的采购由教授转到图书馆。对于那些仍希望帮助图书馆在海外购书的教授们,卢国邦为他们制定了工作指南。委员会与大学图书馆馆长托马斯·巴克曼(Thomas Buckman)达成了协议,同意保留一部分经费作为教授们的“专项购书”费。

245

东亚馆藏于1964年搬至华德森(Watson)图书馆一楼,正式更名为东亚图书馆。卢国邦担任首任馆长,随后又聘请了一名助理馆员。^[11]东亚图书馆将依照堪萨斯大学在东亚研究和教学方面的需要来发展。20世纪60年代,东亚馆藏资料以每年约4千至6千册的速度增长。馆藏资料除图书外,还有期刊、微缩资料、视听资料、展览目录及小册子等。

日本学者大窪愿二(Genji Okubo)帮助卢国邦负责在日本选购图

书。大湟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起就参与堪大东亚区域研究中心的工作。他前后大约有 20 多年协助图书馆发展日文馆藏。二战之前，他曾在加拿大驻东京大使馆工作。这期间，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协助加拿大人赫伯特·诺曼 (E. Herbert Norman) 撰写了《日本维新史》，此书是英文著作中研究日本的经典之作。^[12] 大湟个人学术研究的专长是日本二战前的左翼运动。他坐镇日本替图书馆选购出版物，将平装书改为精装，并代购日本国会图书馆的编目卡片。卢国邦经常称大湟愿二为“行家”或“掌柜的”，并称赞他对堪萨斯大学日文藏书所作出的贡献。^[13]

20 世纪 60 年代，卢国邦与亚洲研究协会在台湾的中文资料研究服务中心代表艾文博 (Robert L. Irick) 达成一项购书协议，购买中国内部资料和微缩资料的翻印本。另外，他也和一家香港供应商建立了收集中国大陆和香港出版物的长期订单协议。1970 年后由于预算削减，这项服务被取消。1965 年年末至 1966 年年初，卢国邦前往欧洲、日本、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当地图书馆和书商建立联系。他在给大学图书馆馆长托马斯·巴克曼的一封信中，提到了 1965 年的图书采购之旅：

在我所遇到的图书馆专业人士中，至少有一半对堪萨斯大学感到陌生。而那些了解堪萨斯大学的，似乎又对我们的东亚项目感到意外。^[14]

在这次看似无具体目的的购书之行中，他收集了许多罕见资料。对卢国邦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这些珍贵资料并因此倍感惊喜：

我找到了特意被掩饰原封面的日本共产党资料《党建设者》，这是一个文献专家为之兴奋的时刻，我拿到了这著名又难得的原始材料！此种感受绝非影印本资料所能给予。对于那些罕见但没名气又很少被使用的资料，除非被你拿到，否则它们的最终归宿可能就是废纸厂了。^[15]

卢国邦收集到的 28 种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初期出版的“没名气”的中文期刊中，北美图书馆当时仅收有 12 种。如不刻意收集，

[12] 在美军占领期间，赫伯特·诺曼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加拿大驻日的外交官参与了日本战后宪法的起草。

[13] 卢国邦 1965 年 7 月向东亚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史密斯提交的备忘录存放在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研究图书馆的大学档案处 4 号书柜，编号 17/37: 1962—1970。

[14] 卢国邦 1965 年 12 月 (从台北) 向堪萨斯大学图书馆馆长托马斯·巴克曼发送的信件存放于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研究图书馆大学档案处，编号 32/1/5: 图书馆报告。

[15] Karl Lo,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Viewed in the First Issues of Some Lesser-Known Periodicals," *Books and Librar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5, no. 2 (1968): 2-8.

[16] Karl Lo, "Impression of the East Asian Antiquarian Book Market," *Books and Librar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3, no. 3 (1966): 2-4.

[17] Karl Lo, "CJK, the Byte That Breaches the Da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Chinese/Japanese/Korean (OCLC CJK) Users' Group Twentie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San Francisco, April 8, 2006.

[18] 参见东亚研究委员会 1969 年 5 月会议纪要, 存放于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研究图书馆的大学档案处, 编号 32/1/5 : 图书馆报告。

它们是不会来到美国图书馆的。在这次旅行中, 卢国邦生动地记录下了他的寻书经历和他对古籍市场的印象。^[16]后来, 他从善本书商那里购得一些私人藏书, 其中包括辛德勒 (Schindler) 的中文典籍和史学文集, 以及斯特恩 (Stern) 的东方艺术藏书, 后者是与堪萨斯大学艺术图书馆合买的。

从 1959 年到 1968 年, 堪萨斯东亚藏书从数百册增长到近 5 万册。多年后, 卢国邦评论道, “图书馆的优势首先取决于它的人员、馆藏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而这些优势均可汇集成一股凝聚力。”^[17]卢成功地打造了堪萨斯大学的东亚馆藏, 依靠的就是这种凝聚力。1968 年 10 月, 卢国邦前往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担任该校东亚图书馆馆长。

246

挑战

1968 年 8 月, 黄俊凯从罗彻斯特大学来到堪萨斯大学接替卢国邦担任东亚图书馆馆长。黄在堪大的一年间继续馆藏建设。由于经费削减, 中国和日本的订单都被搁置下来。他也向图书馆管理层反映了馆藏存放空间不足的严重问题。由于缺乏馆藏空间, 近 1 万多册图书无法上架。在黄俊凯的领导下, 图书馆聘请了两名全职人员, 包括一名中文资料员和一名文员。图书馆继续聘请大湫愿二代买日文书籍。在 1969 年的一次会议上, 东亚地区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史密斯提醒委员会成员注意, “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 就是大学图书馆的行政当局指责国际区域研究项目造成了图书馆的困境。”于是, 国际区域项目驳斥了此种指责。^[18]当时, 来自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不仅支持了东亚图书馆的购书, 同时也支付东亚图书馆的部分人事费用。

1969 年年末, 黄俊凯离开了堪萨斯大学。同年, 来自马来西亚大

学的王浚东担任东亚图书馆临时馆长。1971年尤金·卡瓦柳（Eugene Carvalho）被正式任命为东亚图书馆馆长。卡瓦柳生于日本，通晓日语和英语，他在夏威夷大学获得了日语学士学位，并在西蒙斯大学获得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从1971年到1996年退休，卡瓦柳在任期间对日文馆藏的发展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在短短十余年内，堪萨斯大学的东亚研究项目就发展成了位于芝加哥和美国西海岸间这一地区里的主要项目之一。东亚研究方面的人文和社会学科教授人数都翻了一番。在《国防教育法》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堪萨斯大学开设了东亚语言教学课程。1971年，堪萨斯大学承办了由九所大学联合主办的暑期汉语和日语培训班。

次年，联邦政府不再支持暑期汉语和日语培训项目，注册人数随即减半。堪萨斯大学仍利用一切可能的资金来维持这一项目。然而，由于缺乏联邦和州政府的资助，教职人员的聘任、新项目的发展和图书的采购都受到了影响。1971年7月13日，《堪萨斯大学日报》的一则报导提及此种状况并引用了中文教授卡尔·里班（Carl Leban）的一段感慨之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美国与亚洲关系处于紧要关头时，政府和基金会却考虑要放弃这一领域……亚洲对美国利益的影响也许在一个世纪前我们进入该地区时就已经开始了，而亚洲的影响也因美国过去30年里在亚洲参与的三场战争，一次比一次更趋显著。今天，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这个地区的文化。

1973年，《国防教育法》项目机构中断了对堪萨斯大学东亚研究方面的经费资助，从而严重影响到图书的采购。亚洲的通货膨胀和出版物成本的增加，使东亚图书的价格飙升到空前的高度，再加上美元贬值和联邦政府停止资助，致使图书馆的购买力削减近70%。尽管州政府增加了支持力度，但图书采购却倍感吃力。这种状况并非堪萨斯大学所特有，全美许多东亚馆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增长速度都明显放缓。

尤金·卡瓦柳临危受命，他将大部分的注意力投注在日文馆藏的发

[19] 尤金·卡瓦柳 1976 年 12 月写给图书馆设备规划委员会的南希·本格尔 (Nancy Bengel) 的信件副本, 存放于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研究图书馆的大学档案处, 编号 32/1/8: 1976—1977, 东亚图书馆通信。

展上。在经费削减期间, 图书馆的购书量大幅缩减, 图书馆得以处理大量积压的图书编目工作。在卡瓦柳任期内, 图书馆获得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远东大都会艺术研究中心 (The Metropolitan Center for Studies in Far Eastern Art) 的多项资助, 同时还获得了日本世博会纪念基金 (Japan World Exposition Commemorative Grant) 和堪萨斯州馆际互借项目 (The State of Kansas Interlibrary Loan Grant) 的资助。1976 年至 1977 学年, 卡瓦柳利用学术休假, 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下赴日从事个人研究。

在卡瓦柳赴日期间, 图书馆的规划委员会建议将东亚馆藏并入总图书馆的馆藏中。此时距离东亚图书馆成立才十多年, 显然图书馆规划委员会没有研究以前的决定, 也没有与包括卡瓦柳在内的东亚图书馆人员讨论此事。身处日本的卡瓦柳得知此事后, 深表关注。他一改平日淡定的态度, 急忙给大学图书馆总馆长吉姆·闰兹 (Jim Ranz) 写信报告此事。他也亲笔给规划委员会主席写了长达五页的信件 (他当时在日本, 身边没有打字机), 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委员会的建议。他写道, “对于东亚语言资料, 大部分人们要么缺乏主见, 愿意附庸荒谬的观点; 要么事不关己, 无视它们的价值。在你们目前的规划中, 仅以没有馆藏空间为由而计划解散东亚图书馆, 这恰恰反映了我所描述的上述倾向。”^[19]

247

卡瓦柳引用了儿时听到的一个故事, 来比喻图书馆规划委员会决定拆散东亚图书馆的建议: 一名制作手套的工匠向一位国王敬献了一副只有四个手指的手套, 他告诉国王自己很难按照他的要求制作有五个手指的手套。手套匠建议国王砍掉小拇指以便使他的双手适合这副手套。毕竟, 包括国王在内的大部分人都很少使用小拇指。故事的结局是, 国王命令裁缝为手套匠定做了一套没有脖颈开口的上衣, 并且下令砍掉手套匠的头来试穿特别为他裁制的新装。

信的结尾, 卡瓦柳要求委员会重新审议撤销东亚图书馆的建议, 并且提出在没有征求他的意见的情况下, 不得做出任何决定。他还将整封信抄送给大学图书馆馆长。卡瓦柳知道委员会建议的问题所在。所幸的是, 由于他的努力, 委员会最终未能如愿, 东亚图书馆安然无恙。在他

看来, 这样的事情居然也会发生, 的确是一大遗憾。如果我们能从这段历史中学到什么, 那就是在起伏多变的藏书发展过程中, 东亚馆藏也许会在某天再次面对“被戴上一副只有四个手指的手套”或“我们的计划中没有你们的份”之类的威胁。

直到 1981 年, 图书馆才重新得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被裁撤的中文馆馆员的职位预算。从 1980 年到 1984 年, 包嘉礼 (Gary Bjorge) 担任东亚图书馆副馆长, 负责中文馆藏工作。1985 年到 1987 年, 邓汝言接替了他的工作。他们两人的工作增加了中文图书的馆藏量, 同时为大套的中文丛书的编目制作了分析性词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东亚图书馆将上千份期刊卡片记录转换为自动化系统。1989 年, 图书馆开始使用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OCLC) 中日韩文系统。

馆藏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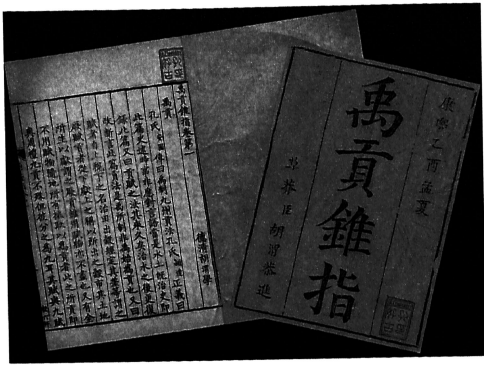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中型馆藏, 堪萨斯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发展总是受到外部力量和大趋势的影响, 它的发展可以从全美东亚图书馆发展的大格局中窥见一斑。根据 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年中国大陆出版了 160 757 册首版图书。^[20] 同年, 堪萨斯大学图书馆采购了约 4 千种中国大陆出版的新书, 不到出版总量的 3%。事实上, 在北美众多的东亚图书馆里, 几乎没有一个馆可以声称无所不收。大部分图书馆每年购买的新书不会超过当年总出版量的 10%。^[21] 正因如此, 堪萨斯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藏采购全都根据在校教授和研究生教学及研究的需要。2007 年, 堪萨斯大学东亚馆藏在北美 51 个参与该年度统计问卷的东亚馆藏中排名第 19 位, 在公立图书馆中则排名第 9 位。^[22]

根据钱存训和文格 (Howard H. Winger) 的统计调查报告, 1964 年,

[20]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7*, China Data Online. <http://chinadataonline.org/>, 2008 年 9 月 17 日。

[21] *Shuppan nenkan, 2007* (Tokyo: Shuppan Nyususha, 2007).

[22] 有关 2007 年馆藏总量的排名, 可参考东亚图书馆统计委员会统计数据库, <http://www.lib.ku.edu/ceal/default.asp>。



[23] Tsuen-hsuei Tsien and Howard W. Winger, eds., *Area Studies and the Libra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堪萨斯大学东亚藏书量在北美 46 所东亚馆藏排名第 27 位。^[23] 当时，北美三个最大的东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藏书总量是其他所有东亚图书馆藏书总量的近一半，此比例至今仍然未变。1964 年，位居前 15 名的东亚馆藏，在 2007 年仍然保持前列，其中 12 家机构的藏书量均超过 50 万册。另一现象就是中型馆藏的稳步发展，特别是包括堪萨斯大学东亚图书馆在内的美国中西部大学的东亚图书馆。

中文馆藏

从 1959 年到 1973 年，在《国防教育法》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堪萨斯大学图书馆有计划地采购了各种中文资料，包括丛书、史书、文集、传记、百科全书和各学科的参考用书。例如，图书馆购买了张之洞 1874 年所著《书目答问》里所列的两千多种图书。图书馆也补齐了邓嗣禹和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合著的《中文工具书选编题解》中所列，但馆藏中缺的中文参考书。馆藏亦收有大量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传统学者用文言文所著的历史文献，以及五四运动时期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史学专著。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中国台湾的出版商大量再版了民国时期出版物，这些台版的大套文史哲经典著作、正史和地方志构成了中文馆藏的基础。另外馆藏中也有民国早期至 30 年代的期刊，其中多为微缩胶卷资料。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善本古籍图书和早期期刊的重印本开始大量出现在市场上。东亚馆也尽力收藏这些资料。近十年来，馆藏收入的电子资源大大方便了学术研究，但其高昂的成本占去了图书经费预算的一大部分。

中文馆藏内容广泛，涵括历史、艺术史、语言、文学、哲学、宗教

< 图 19-2

带有“孔好古印”的1705年版《禹贡锥指》
照片由堪萨斯大学东亚图书馆提供

> 图 19-3

1730年版的《钦定四库全书》
照片由堪萨斯大学东亚图书馆提供



及现代社会科学类文献。人文馆藏多半支持博士生研究，而社科馆藏多支持硕士生研究。历史文献方面最具优势的领域是宋、元、明、清研究文献，其中地方志着重华中、华北和西北地区；其他具有优势的馆藏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资料以及有关中国“文革”以后的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的文献。

艺术史也是馆藏优势之一，所收资料尤以唐、宋、元、明、清绘画、雕塑和书法为主。馆藏有画家个人作品（以元、明画家为最）、博物馆和美术馆馆藏目录、展览目录、文人画家传记和文集，以及艺术批评等方面的资料。艺术史类藏书中堪称珍品的有元明绘画、敦煌壁画以及 6 至 10 世纪的书法史研究文献。堪萨斯市纳尔逊—阿特金斯（Nelson-Atkins）艺术博物馆距堪萨斯大学劳伦斯校区约 80 公里，它是全美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顶尖博物馆之一。堪萨斯大学中国及亚洲艺术史项目得到了该博物馆的大力支持。

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收藏有汉语语言文字学研究、唐宋诗词、元明戏曲、明清小说和散文著作等方面的资料。图书馆于 1965 年购得布鲁诺·辛德勒（Bruno Schindler）文库藏书^[24]。它收录有 296 种作品，共计 670 册，大部分是中国古典著作。^[25]文库中包括十几本善本书，例如宋版的《尔雅》和《诗经》。辛德勒文库中的部分藏书曾属于德国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其藏书印章“孔好古印”在《禹贡锥指》（康熙四十四年，即 1705 年刊本）和其他一些藏书中均可见。^[26]东亚语言的善本和手稿多存于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研究图书馆特藏文库，其中一部珍本是 14 世纪（大约 1350 年）以金粉绘写的中韩文版《大方广佛华严经》第 45 卷。这部手抄本曾于 2003 年 10 月到 2004 年 1 月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高丽王朝：朝鲜启蒙时期——918 年至 1392 年”展览会上展出。此次展览由亚洲艺术博物馆、韩国国家博物馆及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共同举办。此本于 1956—1957 年间由图书馆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汉学教授理查德·鲁道夫（Richard Rudolph）手中购得。

佛学研究馆藏着重佛典的收集，包括《大正新修大藏经》、《宋藏遗

[24] 布鲁诺·辛德勒是一位德国汉学家，他曾师从于孔好古。1912 年他旅居上海犹太人社区。在华期间，他研究中国开封的犹太人。1920 年，他在德国创建了《亚洲专刊》。

[25] 卢国邦 1965 年 5 月致斯图亚特·福尔斯副馆长的信件，存放于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研究图书馆的大学档案处，编号 32/1/5；图书馆报告。

[26] 孔好古是一位汉语研究专家。他曾是林语堂博士在莱比锡大学的论文指导教师，并发表过许多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27] 伯顿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曾在1946—1949年担任合众社北京分社社长，也在香港为美国提供信息服务并担任美国广播公司(ABC)广播网通讯员。他以代写《张国焘回忆录》而出名。

[28] 郝若贝是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史学家。他曾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并与夫人共同组建了“中国历史软件有限公司”。他用了30年时间研发出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后来赠予了哈佛燕京图书馆。

[29]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ttp://www.fas.harvard.edu/~chgis/>。

珍》、《中华大藏经》、《房山石经》、《永乐北藏》及各种版本的佛典和寺庙志。中文缩微资料着重于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和期刊，同时也收录了美国神学图书馆协会出版的各种民国时期基督教在华宣教和本土基督教派发展的期刊。堪萨斯大学图书馆于1991年获赠罗伯特·伯顿(Robert Arthur Burton)的藏书，^[27]涉及中国共产党和“文革”时期的英、中文出版物，包括党的领导人的演讲、党的政策、宣传小册子和个人著作，总数超过2千多册。2001年，图书馆获赠郝若贝夫妇(Robert Hartwell and Marianne Colson Hartwell)的文库。^[28]郝若贝是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早期的资料贡献者。^[29]郝若贝文库包含1千余册中国经典著作、正史以及中古时期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资料。

日文馆藏

20世纪50年代初期，堪萨斯大学日本研究教授和大湊愿二开始协助图书馆建立日文藏书。馆藏的优势领域包括日本艺术史、二战前的日本左翼运动、日本社会和经济史、古典及现代文学、戏剧和舞台剧等。从2000年开始，日文资料的收藏扩展到电影研究和流行文化，并且收集跨学科研究资源。

日本艺术史藏书是馆藏的优势资源之一。图书馆积极采购日本出版的此类图书以及日本大、中型博物馆的展览目录。馆藏着重于中世纪到前现代时期的绘画，包括平安时期、室町时期以及安土桃山时期创作的画卷。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江户(德川)时期的绘画、浮世绘和木版画，这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所购得的哈罗德·斯特恩(Harold Philip Stern)文库。斯特恩是美国艺术史学家，主攻亚洲艺术。他曾于1971年至1977年担任美国首府华盛顿史密森尼(Smithsonian)博物馆弗瑞

尔 (Freer) 美术馆馆长。斯特恩文库收藏了上千册有关中、日文艺术和艺术史资料, 其中尤以日本的浮世绘和木版画为最。近十年来, 馆藏亦注重 20 世纪商业艺术资料的收藏。

[30] University of Kansas East Asian Library, "In Godzilla's Footsteps," <http://www.lib.ku.edu/eastasia/exhibition/godzilla/index.shtml>.

250 日文馆藏的另一个优势领域是表演艺术。藏书收录日本歌舞伎 (Kabuki) 和能剧 (Noh) 的原始文献和二次文献。为支持教学和科研, 图书馆也收藏了歌舞伎、能剧和其他传统表演艺术的音像资料。这些资料都可通过馆际互借服务, 免费借给美国其他各地图书馆的使用者。

日本历史文献, 尤其是明治至昭和前期的历史文献, 是日文馆藏的另一个优势。其中有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资料, 包括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原版和重版期刊、专著, 以及二战前后日本左翼运动的历史资料等。

妇女研究项目的收藏包括有关日本明治和昭和前期发行的重要妇女期刊的重印本, 以及二战期间慰安妇的原始资料。有关传统饮食文化的资料大大丰富了日本民俗信仰研究的馆藏, 后者包括平安时期到江户时期创作的鬼怪著作和绘画。这些资料方便学者对日本民间信仰和流行文化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其他有关日本流行文化的馆藏, 如漫画和动漫, 经常引起学习日语的学生们的兴趣。图书馆在 2004 年举办了一次学术展览, 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哥斯拉 (Godzilla) 动漫电影在日本历史和社会环境下的发展, 该展览与当时在校内举办的哥斯拉全国学术会议共同举行。^[30]

韩文馆藏

图书馆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收藏有关朝鲜古典文学与历史方面的资料。韩文馆藏主要包括朝鲜研究的核心参考书、古典文学和语言、民间

[31] *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Kansas Libraries, <http://lib.ku.edu/CEAL/php/>.

[32] Carolyn Brow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rea Studies," in *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 and Library of Congress International Collections Development Workshop, February 27-28, 2006* (Washington, D.C.: 2006), Chicago: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 http://www.crl.edu/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pages/Brown_CRL-LOC.pdf.

文学、历史、艺术史和考古学等领域的文献。自 2002 年起，馆藏扩大到 16—18 世纪朝鲜艺术史研究、佛教美术，以及 4—6 世纪朝鲜和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考古文献。近十年来，为加强当代朝韩研究，在韩国基金会和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电影档案馆的协助下，图书馆收集了当代韩国历史、文化、政经的出版物并为学者提供有关韩国研究的数据库及音像资料。

应对时代变化

堪萨斯大学东亚图书馆自 2000 年起，为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设计和研发了一个东亚图书馆统计数据库，收集了北美东亚图书馆自 1957 年以来出版的馆藏统计资料，^[31]其数据可追溯到 1869 年国会图书馆的藏书统计。数据库还包括北美东亚藏书的各项信息：馆藏总量、每年新增图书量、期刊总数、其他馆藏和电子数据库资源、馆藏经费、人事以及读者服务等方面的资料。统计数据库还提供每个图书馆的联系信息。

今天，国际区域研究项目正迈向新的境界——从具体的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扩展至“跨区域”、“跨疆界”和“跨国家”的研究。因此，诸如环境、人权、移民、少数民族和民族主义以及流行文化等研究就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不论是在人文还是在社科研究方面，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不断出现。^[32]堪萨斯大学明史专家约翰·达德斯（John Dardess）2002 年就此种变化表达了他的观点：

或许有些人会注意到，中国史的研究被分化为各种专题和子领域的做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样一来，电子资源的开发就比将中国史作为

一个总体要容易得多……似乎在可预见的未来，断代史或广义的汉学将持续衰退，而子领域里的专题研究将持续兴盛。我们历史系今后招聘教授将优先考虑专题领域的研究，包括妇女史和环境史、中华帝国史以及原住民和少数民族史。毫无疑问，我目前的这个中国前现代史的教授职位，最终将会被某些上述专题领域的专家取代。教授的选聘会直接影响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可以想象的是，下任教授的选拔会偏向中华帝国或少数民族方面的研究……最近，大清帝国是一个引起人们强烈兴趣的史学主题，尤其是它在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影响。研究这一领域的新教授可能会要求图书馆不仅购买更多的汉语资料，也要购买满语、维吾尔语、藏语和蒙古语的资料。^[33]

互联网和电子检索技术也为国际区域研究图书馆的信息采集、收藏、保存和服务增加了全新的视角。在过去十多年中，美国大学与学术机构举办了多次学术会议，就从事国际区域研究的图书馆馆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这一议题进行讨论。著名的会议包括1995年和1997年在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此类会议、1998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举办的美国大学联合会/研究图书馆联合会(AAU/ARL)全球资源项目会议、2005年在耶鲁大学举办的全球资源网络研讨论坛和2006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举办的国际藏书发展讨论会等。^[34]

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曾言，“在教授们为我们使尽了浑身解数之后，我们能够获得知识的来源就是书本了。如今丰富的藏书就是真正的大学。”过去50年里，堪萨斯大学东亚馆虽然经历坎坷，但却稳步发展。当未来的读者使用这个图书馆时，他们是否会意识到这个馆藏所包涵的价值和愿景？他们是否能领悟到馆藏所反映的时代变迁？他们是否会好奇地问是谁选择和组织了这些资料？这个馆藏能够满足未来学者们的需要吗？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35]

[33] John Dardess, "Chinese Collections: A View from the Midwest," keynote address, Greater Western Library Alliance (GWLA) East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Lawrence, Kansas, June 10, 2002.

[34] 这些会议包括1995年7月13—14日在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分校举办的“展望国际区域图书馆员专业发展研讨会”、1997年7月18—19日在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分校举办的“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国际区域图书馆员专业研讨会”、1998年6月24日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举办的“美国大学联合会/研究图书馆联合会(AAU/ARL)全球资源项目：促进合作”会议、2005年3月24—25日在耶鲁大学举办的“全球资源网络会议论坛”和2006年2月27—28日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举办的“国际馆藏发展专题研讨会”。

[35] 作者感谢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Kenneth Spencer)研究图书馆大学档案室的馆员帮助检索文献，也感谢堪萨斯大学日本研究图书馆馆员伊藤伦子(Michiko Ito)在日文馆藏历史方面所给予的协助。

第十九章作者：傅玉波（Vickie Fu Doll）

堪萨斯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国及韩国研究图书馆馆员。祖籍辽宁，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获得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学士学位，堪萨斯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硕士学位，辅修东亚研究。她自1999年起担任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统计委员会主任，并从2000年开始主持该协会统计年报的编辑出版工作。